

渤海国及其文化遗存

第一分册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



渤海国及其文化遗存

——三 第一分册 三——

(苏) Д·В·沙弗库诺夫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 林树山译

本资料仅供内部参考，引用时务请

核对原文，注明出处时请按原著。

长 春 1979

译者说明

《渤海国及其文化遗存》，译自一九六八年苏联列宁格勒出版的《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一书。因原书各太长，而且书中还涉及到我国东北地区的渤海文化遗存，故由译者改为现名。本书是近年来苏联史学界研究渤海的一门代表作，对了解苏联研究渤海的全过程、现状、目的、观点和水平，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Л. В. 沙弗库诺夫是苏联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也是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专门研究渤海的学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此人自一九五五年以来，先后发表的渤海专著（包括科学院存档手稿）竟达十五册（篇）之多。其作品附和东方学家А.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的论调，并深得该氏赏识。

此书一开头便声称：正像汉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一样，黄河北的领土“是突厥、蒙古、通古斯满洲各族的故乡”。在结语中又说：“滨海边区的历史——是我们伟大的多民族祖国（苏联）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见，作者写这本书的用心无非是为霸权主义“发愿”制造借口而已。

全书分七个部分：绪论；第一章渤海的先声——挹娄和韩
靺各部落；第二章渤海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历史；第三章渤海国
的领土、居民和行政体制，居民的生业和社会经济状况；第四
章滨海边区的渤海文化遗存；第五章满洲的渤海文化遗存；结
语。作者在书中还考证了一系列河流、民族和国家的古代名称。
书中插图8幅，图版36张，约十四万字。现在印发的是绪论、
前三章和参考书目，约八万字，加称“第一分册”，其余部分待
续。

为编选此书，沙氏参阅了国内外八种文字的一百二十五万
历史文献，可见用心良苦。遗憾的是，沙氏对古典汉语显然未
必了了，以至误解和臆测之处甚多，有的地方甚至胡乱发挥，
造成大错；因此也就导出十分错误的结论。译者出于无奈，谨
在每章之后附“译者注”，略加说明。

本译文仅供内行参考，希望史学界老师们和朋友们批评指
正！在编译过程中，考古研究室的同志们曾给予译者莫大帮助
谨致谢意！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渤海的先世——挹娄和靺鞨各部落	20
第二章 渤海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历史	71
第三章 渤海国的领土、居民和行政 体制。居民的生业和社会经济状况	89
参考文献	115

结 论

渤海国的历史(698——926年)与共先世部落靺鞨和挹娄的历史密切相关,而这些部落的历史发展道路又是远古时期中共亚细亚和远东各国、各部落联盟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国学者很久以来便对这一部分亚洲大陆的往事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这并非偶然。形象地说,因为一个摇篮恰处在这里,后来古代世界的一系列最大种族组织都来自这一摇篮,而这些种族组织则为许多民族和部族奠定了基础。

比方,如果说黄河中下游流域及共南部邻近疆域有权认为是汉族的远古发源地,那末黄河以北的领土就有同样的理由可以认为是突厥、蒙古和通古斯满洲各族的故乡(23, 436页)。在这里发生的一些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不仅在毗邻的亚洲各地,甚至连亚洲以外也常常引起强烈的反响。匈奴人西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支洪流一直席卷到亚得里亚海滨。得名为“民族大迁徙”的这次迁移,对强大罗马帝国的覆灭起了不小的作用;而罗马帝国对欧洲、亚洲和非洲各国都有过极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大约经过一千年,大批大批的蒙古人又从这里西迁;他们的毁灭性侵袭和征服,给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发展以十分消极的影响。

在更远的年代，即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正像好些考察家所推测的那样：还是从这里开始，原始人类占据了东北亚的辽阔地域，然后又从这里移居北美和日本列岛（62, 3—4页、36页、42—43页；63, 11—33页）。

研究渤海及其先世的历史，对于弄清这些久加研究却又重要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比方说下列问题：渤海国及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前提、特点，鞑靼渤海社会内部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渤海及其文化在中央亚细亚东部和远东各国、各民族历史中的作用与地位等。

在研究这些或那些历史过程时，某些外国研究者曾提出一种推测：渤海国对唐帝国或日本国存在某种臣属关系（17, 1—20页；58, 41页）。顺便说一下，当时日本国本身尚且处于形成过程中。

实际上，正像史料所证明的那样，渤海是一个既不赖此也不靠彼的国家；它是当时远东文化、政治历史中的特出现象。

还应顺便指出，根据东亚历史学术知识的目前水平可以断言：渤海国并非独立于强大唐朝之外的唯一国家。中世纪时期，东亚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强大国家组织，都曾存在好长时间。比如，南诏、吐蕃（西藏），若二东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等。这些国家都曾如此地有组织是如此地强大，以致多次同他们的

強邻进行卓有成效的战争，捍卫了自己的独立。

对于那些不正确的概念，首先可用下文作解释，即不久以前对渤海及共先世历史的研究还很不够，而且也未完全阐明过。因而，为了用具体史料充分说明史实，亟需全面深入地研究苏联远东及共毗邻地区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这是显而易见的。

通古斯满洲各部族的族源问题，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这些民族遥远往事的考察程度。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分析表明，现在的那乃人、乌德盖人、乌耳奇人、奥罗琴人、满洲人，某种程度上的基里亚克人，他们的历史都与渤海及共先世部落鞑靼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62）94；95）471。

早在公元一千纪后半期，各鞑靼氏族部落联盟的不平衡性已逐渐发展，略具规模。十世纪初，契丹人灭亡渤海并占领其部分领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当时已经以女真着林的各鞑靼部落之间的隔绝和不平衡性。这一切不能不导致一些虽属同流，却已完全隔绝了的种族联盟的形成，这些联盟以一个核心。几个世纪期间在这一核心周围形成了现代远东的通古斯满洲各族。有鉴于此，很想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古代文学史料一涉及女真人，便明显地把他们分成几个大的地方性联盟。在一些场合下

这些联盟均以所在地区的名称出现（125, 90, 94, 101页）。这里只是些小的区域性部落联盟。在另一些场合下，整个女真部落被分成三大支：北女真、南女真（125, 101页）和东女真（40, 136页）。南女真有时也称西女真。正像文献史料的分析所判断的那样，后来从占据松花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和滨海边区领土的北女真人中形成了如下部族：那乃、乌且奇、奥多奇和乌德盖人。而从居住在辽东地区、鸭绿江沿岸和松花江上游的南女真人中分出了满洲人。

这样一来，我们便碰到当时斯拉夫诸部落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它们也分为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人，以后由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条件形成了一支在种族上同源的民族。

今天，在苏联的远东领土上，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工作开展得越来越广泛；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第一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周密地回答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些渤海国历史方面的问题。比如，最近进行的野外调查，在滨海边区首次发现两处极有意义的渤海文化遗存，后来又在考古发掘中进行了考察。仅以当时所获得的一些成果，便可以批判地修订此前积累的一些中世纪时期的考古资料。这些成果不仅可以把滨海边区和阿穆尔边区一些中世纪遗存的断代问题搞清到一定程度，还可以把

远古渤海人以及契丹人和女真人文化的形成途径和性质问题搞清到相当程度。

在发现滨海地区渤海文化遗存之前，俄国和苏联的一些学者、地志学家就曾进行过长期的探索和考察。

在俄国、对苏联远东南部历史的研究，始于1655年；当时俄国的哥萨克们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发现特林寺的废墟和几块带铭文的石碑（65, 335—344页）。特林遗存的发现和关于它的首批文字记述（82, 13页）以及收录在十七世纪

些文献中的有关阿穆尔及其支流上各古城废墟的某些记载，早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就在俄国社会的一定范围中引起对远东古史的极大兴趣；而且，当时的一些学者都试图对这些遗存加以自己的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和假说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例如，在С. Я. 烈密佐夫对特林遗存的来历所提出的一些解释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认为这些遗存，不是别人而是马其顿亚历山大所遗留下的（65, 335—344页）。

十九世纪，特别是它的后半期，出现了著名俄罗斯汉学家Л. Ш. 比丘林（雅金夫）、Б. 戈尔斯基和Б. П. 瓦西里耶夫的著作；他们在这些作品中，对滨海边区、阿穆尔边区及相邻的外国远东地区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作了总的评述。正是由于这些作品，才第一次有可能科学地阐述那些当时已为人

所共知的我国远东古代文化的古物遗存。

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随着阿穆尔边区，之后是滨海边区并入俄国，俄国移民便开始加强对这些领土的开发；当时对历史和考古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就在这时，为了金石研究远东，向那里派遣了许多科学考察队（其成员是一些在职务上与历史学毫不相干的人），这些人对考古遗存也表现出很大兴趣，并为科学研究保存了一些有关遗存分布地点和原始状态的宝贵资料。在这方面，矿业工程师H·安诺索夫（8；9）和洛帕京（53, 102—104, 页、193页）的一些著作就尤其珍贵；他们都在滨海边区南部进行过地质勘察。在这些作品中，都可以见到一些关于古城的记述，这些古城的一部分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还可以见到一些对古矿场的指示，主要是金矿场；甚至可以见到某些关于古物发现的描述。而且，H·洛帕京还准备出版一部巨著，他把滨海边区、阿穆尔边区和萨哈林岛的四十九处古物遗存的资料汇集到一起（100）。这实际上是我国远东第一套有关古物遗存的巨作。在作品中作者除了记述这些遗存的分布地点以外，还为一些石雕和建筑物的细部作了素描，这些都是在今日乌苏里斯克市区、女真人的一些居址废墟的现场发现的。

兴法罗夫（帕拉基）当时对滨海边区和阿穆尔边区历史的

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从女真人的历史中保存下来一些极其珍贵的资料，还发表了好些有关古物遗存的报道和记述(71)。是他第一次提出了，滨海边区的现有古城都属于渤海人和女真人的思想。诚然，П. 卡法罗夫同时也犯了严重错误：他断言，滨海边区的“所谓石谷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很晚，即到十一世纪初”(公元)(71, 326页)。他的这一主张，后来被一些其他研究人员当作真理而接受。他们借用П. 卡法罗夫的威望，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一种当地部落永恒落后的思想。因此，渤海国的建立及其当时的高度文化这一事实本身被他解释为不是这些部落历史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从外边引进和强加的国家统治形式的效验，是一些较发达邻国影响的结果(10, 314页; 25)。

整个说来，革命前的历史学家和远东地志学家的多数研究，都带有十分不连贯的性质，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偶然从事。对滨海边区古物遗存较为有系统的研究是从1884年开始的。当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了阿穆尔边区研究会，中·中·布塞被选为该会的主席。中·中·布塞与Г. 山·马尔科夫、B. И. 马尔加里托夫、П. А. 克拉波特金协作，对滨海边区和阿穆尔边区的古物遗存行过多年的系统考察(10: 19)。在自己的作品中中·中·布塞首次为滨海边区的古代史分期。他

把这段历史分为两个大的时代：原始人类时代和中世纪时代。他又把中世纪时代划分为四个时期：1) 渤海国存在时期；2) 女真人的金朝在边区的统治；3) 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4) 满洲人的征讨。

1916年，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市出版了一部A. 三·费多罗夫的短篇著作——《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市及其郊区的古代遗存》。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不仅做了描述，还把所有当时所知道的位于乌苏里斯克市郊的中世纪遗存都画在平面图上。早些时候，曾有B. K.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些短篇著作问世。他作为当时的一名军事地形测绘员，考察、记述并把他在滨海边区东海岸发现的大勇古城、堡测绘在平面图上。可惜，B. K. 阿尔谢尼耶夫所汇集的有关中世纪遗存的资料至今尚未发表，部分资料作为不完整的手稿现今保存在全苏地理学会滨海分会的档案袋中。

B. K. 阿尔谢尼耶夫还发表了他对滨海边区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分期，该分期由四个时代或时期构成：

“1) 原始人类时代——石器时代。

2) 七世纪前文明的满洲各部落与最古老的地方居民的斗争。

3) 八——十二世纪的渤海王国。

4) 1386 年前的金(黄金)帝国……”。

按 B. K. 阿尔谢尼耶夫的观点, 在滨海边区根本未曾有过青铜器时代(10, 315 页)。

B. K. 阿尔谢尼耶夫的分期同样过于概括和简略, 不仅如此, 即使同中·中·布塞的分期相比, 该分期也是一大退步。总而言之, 无论是 B. K. 阿尔谢尼耶夫, 还是中·中·布塞, 正像 H. 伊凡尼耶夫对此公正指出的那样, “由于对古物遗存研究得薄弱, 都未能做出比较详细而准确的分期末”(39, 246 页)。

跟在一些先于他的俄国和外国研究者之后, B. K. 阿尔谢尼耶夫也认为, 渤海国的产生仅仅是由于外来各部落的影响和干涉, 而这些外来部落都比当地靺鞨各部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10, 314 页)。事实上, 正如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们所指出的那样,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5, 169 页)。它“产生在社会分成阶级的地方和时候”(7, 69 页)。

总之, 应当指出的是, 尽管革命前的研究者对滨海边区和阿穆尔边区遥远往事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他们对业已积累的考古资料的系统和综合方面做得却很不够。他们的全部活动基本上可归结为对一些古代遗存的披露和描述, 而且对这

些遗存的断代往往带有十分随意的性质。结果，他们把大多数中世纪遗存误认为渤海时期的遗存。然而，近年来的考察证明，能够纳入渤海时期的，目前只有克拉斯基诺古城和南乌苏里斯克古城的下层。大部分滨海边区的中世纪遗存，均属于较晚的，即十一——十三世纪的遗存。

因此，渤海的文化遗存，如乘不包括一些个别发现，实际上革命前无论在滨海边区还是在阿穆尔边区都无人得知。

事实上，对渤海文化遗存和渤海史的研究，仅仅开始于苏维埃政权年代。十月革命前，一般说来在我国很少有人知道关于渤海的历史文献。在H. 9. 比丘林(15)、B. 戈尔斯基(25)、3. A. 帕诺夫(74)、M. 波乔德涅夫(76)的一些著作中，也只有一些关于渤海的个别史料。

1926年，出版了一部当时最完整的渤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该书的作者是远东大学副教授3. H. 马特维耶夫(55)。在这部书中，他收集并综合了当时他所掌握的全部古代文献史料。但在这部著作中却根本没有考古资料，因为这类资料当时在研究者手中本来就不存在。在翻译编年史文时，3. H. 马特维耶夫在好多地方都弄得不准，存在遗漏，没有引文来源。尽管有这些不足，但3. H. 马特维耶夫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渤海国政治历史方面的一部最完整的俄文作品。

1953年，在渤海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一年组成了苏联科学院远东考古勘察队，著名的古代西伯利亚及远东考察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教授领导了这支勘察队。

由于不懈的探索，早在1955年就在捷丘赫——码头镇附近发现了第一座渤海古城。然而，由于缺少确切的考古断代资料，便无法认证该古城属于渤海时期，只是提出一种推测：与女真人的遗存相比，该古城的起源要更早些，以及大多数中世纪的滨海边区古城都具有两层的性质；诸如此类的，如南乌苏里斯克古城、尼古拉耶夫斯克古城、丘古耶夫斯克古城、萨彦巴尔斯克古城；这些古城的下层被认为属渤海时期，而上层则被认为属女真时期（101）。后来，这一推测只被南乌苏里斯克古城的一些考古资料所证实（88:82—84页；93:114—120页）。至于其余的上述古城的下层，正如1963年的一些考察所证实的那样，应该说属于较晚期，即属于十一—十二世纪。

1954年，着手清理南乌苏里斯克古城区域内的渤海层。为此，远东考古勘察队的研究员H. H. 扎别莉娜，对乌苏里斯克市南部地区的一个丘岗进行了部分发掘。在丘岗脚下，发现了古代建筑基础的残存，根据这里找到的两枚“开元通宝”

硬币，H·H·扎别莉娜曾认为该古代建筑应该属渤海时期。也是在这里，又找到一枚十一世纪的硬币，还找到一片屋檐瓦，该瓦带有菱形瓦当，瓦当饰“纹呈花叶状”（34）。

本书作者参加了勘察分队的工作，依据手头占有的广泛考古资料，现在得出结论：1954年发掘的，并不是八—九世纪的遗存，正像H·H·扎别莉娜在共著作中对此断定的那样，而是十二—十三世纪的遗存。最能证明这一点的，首先是那片带有菱形瓦当、瓦当饰“纹呈花叶状”的屋檐瓦。这种瓦，正如后来的一些考察所证实的那样，只属较晚期所特有，其中包括十一—十三世纪（42，170页），也包括女真时代（92）。

至于在南乌苏里斯克古城区域发掘丘岗时发现的古钱资料，这里应该指出，女真人由于对宋代中国的长期战争而感到钱财匮乏，1127年在虏获中国皇帝钦宗的同时，掠获了他的全部金库，并把掠获来的这些中国硬币发行使用；一直到女真人第一批自制货币发行之后，这些中国硬币仍在继续流通（115，175—181页）。女真人在十一—十二世纪掠获的、后来又被他们通用了的中国硬币中，含有大舅的七—九世纪通行的“开元通宝”硬币（37，306—307页）。

1957年，发表3A·П·奥克拉德尼科夫论日本考古学家发掘渤海上京遗迹的文章。上京位于现今中国东北东京城附